
葡月的错位

(三) 现实关系的财富与两种斗争

作者：张皓翔

ORCID: 0009-0001-2997-7726

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是无法仅仅被物质所喂饱的。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写下这样一句警醒后世的论断：“个人的真正精神财富完全取决于他现实关系的财富。”【Die reale geistige Frucht des Individuums hängt gänzlich von der Frucht seiner realen Beziehungen ab.】这里的“现实关系的财富”，绝非国民经济学视野下简单的物质财产积聚，更不是庸俗唯物主义所幻想的实物占有数量。它强调的从来不是某种绝对的财产多寡，而是一种现实的、实践的、社会关系的成熟程度。

在工业时代，受制于生产力发展的不充分，马克思与恩格斯固然未能将这一“现实关系的财富”在政治经济学层面进行完备的定量定义，但他们早已敏锐地洞察到它与单纯财产占有的本质区别。在哲学层面，他们将这两者划出了不可逾越的界线。“现实关系的财富”所涵盖的，固然包含物质财富，但它彻底扬弃了形而上学看待财产的狭隘视角，转而确立了一种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即由其社会关系所决定的、“资本—雇佣—权力”架构下动态而非静止、辩证而非孤立的财富。它关乎的是人作为社会存在物，能否在现实的生产关系中获得主体性的展开，而非仅仅作为生物体获得卡路里与庇护所的供给。

然而，二十世纪以来的资产阶级卫道士们，却极其卑劣地歪曲了这一哲学论断。他们将国民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分野用意识形态烟雾遮蔽起来，试图用“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来掩盖“社会关系的彻底异化与剥夺”。他们将历史局限下马克思聚焦于实体生产资料法权占有的表象，歪曲为形而上学的财产多少论；错误地将“生活决定意识”误读为了“物质决定意识”，将“现实关系的财富决定精神财富”误读为了“绝对的财产多少决定了精神的盈亏”。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在其名著《静默革命》中大肆宣扬：“例如，一个在沙漠中迷路的人，可能会执着于对水的需求……一旦他的食物供应达到了维持生存的水平……西方社会人口中的重要群体就已经跨越了这些阶段，今天正在追求与经济安全命令不再有直接关系的利益目标。”【A man lost in a desert, for example, may be obsessed by his need for water... Once his food supply has reached a subsistence level... important groups among the populations of Western societies have passed beyond these stages, and today are acting in pursuit of goals which no longer have a direct relationship to the imperatives of economic security.】同样，安东尼·加斯科尔在《社会主义的未来》中也做出了如出一辙的断言：“没有证据表明贫困化在加剧。相反，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急剧上升，凯恩斯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失业，战前不景气和大众苦难的旧循环已被打破。工人现在在现有秩序中拥有利益，拥有稳定的就业、福利保障、养老金和不断增加的实际工资；因此，马克思建立在物质贫困基础上的革命颠覆动机，对于绝大多数劳动人口来说已经消失了。”

【There is no evidence of increasing immiseration. On the contrary, working-class living standards have risen sharply, unemployment has been largely abolished by Keynesian demand management, and the old pre-war cycle of slump and mass misery has been broken. The worker now has a stake in the existing order, with secure employment, welfare benefits, pensions and rising real wages; the motive for revolutionary overturn, which Marx grounded in material destitution, has therefore vanished for the bulk of the working population.】

这些理论家们沾沾自喜地宣称，马克思的革命逻辑已经伴随着高工资、高福利与高消费的到来而彻底过时。他们以为，只要用物质温饱与消费主义的“面包与马戏”塞满劳动者的肚子，革命的引线就会被永远切断。

但这群资产阶级的卫道士们彻底搞错了对象。他们有一点没有说错：劳动者确实不再单纯为自己作为生物体的人的生存而斗争了；但他们完全视而不见的是，人们仍会为了自己作为社会体的人的生存而斗争！后一种斗争，是比争夺一日三餐更高级的斗争，也是比诉求福利让步更深刻、更为彻底的斗争。它不再仅仅满足于革除某一种具体的分配不公，而是直指其“现实关系的财富”！

随着生产力的飞跃以及资本的当代升维，数字资本主义将算法、数据、平台与即时通讯技术全面引入生产过程，我们终于可以进一步将马克思文本中的这一哲学概念，进行严格的政治经济学升维。在当下的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现实关系的财富”的实质，就是对个体与社会的劳动力商品生产的实际掌握能力。它在关系上是一种“资本—雇佣—权力”的关系网，在哲学上则是动态的、辩证的现实关系之展现。

在传统的工业时代，对劳动力生产的支配往往需要假借于对实体生产资料（如厂房、机器）的法权占有这一中介来实现。这使得庸俗经济学者得以用“法权占有”来掩盖真正的支配关系。然而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对劳动力生产过程的支配已经脱去了实体的中介，实现了直接的、无孔不入的微观渗透。无论是被绩效与科研指标深度规训的高校学者、被总部算法微观监控的加盟店主，还是拥有高薪却被接口与代码全天候束缚的高级程序员，他们在国民经济学意义上或许拥有丰厚的薪水、房产与股票，被划分归入所谓的“中产阶级”；但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他们对自身劳动力生产过程的自主支配能力几乎为零。

他们拥有物质产品的消费权，却丧失了作为“社会体的人”的生产主导权。他们所获得的物质财富，不过是资本为了实现劳动力再生产而预付的生产成本；而他们所丧失的“现实关系的财富”，则是作为一个人自由展开自身生命活动、自主掌控自身劳动力生产过程的全部可能。当这种“现实关系的财富”被剥夺殆尽，当劳动者被异化为仅仅维持系统运转的神经元与数据接口时，冲突便不再源于肚子的饥饿，而源于灵魂的窒息与社会性存在感的断裂。

因此“第二种斗争”，其深刻性与彻底性在于，它所指向的不再仅仅是简单的私有制法权表象，而是托举着私有制最深层的根基——劳动力的要素化。

要深刻理解第二种斗争的终极指向，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劳动力要素化的历史本质及其与私人掌控的耦合过程。劳动力要素化，是将人的活的生命活动，从混沌的、自由的生命整体中强行剥离、抽象出来，使之成为一种可以被独立识别、精确衡量、跨时空安排和系统调配的生产要素。劳动力的要素化固然是人类生产力飞跃的组织前提，但它同时也是压迫的总根源。因为在要素化的那一刻起，劳动者就已经丧失了对自己生命支出的完整自主权，其生命被降维变成了生产系统中的一个变量。而当这种已经被要素化的劳动力，与排他性的私人掌控——无论

这种掌控在中世纪表现为土地所有权，还是在今天表现为资本对算法、数据及平台生产资料的垄断——相结合时，压迫便升级为了系统性的剥削。

在第一种斗争中，即工业时代的传统工人运动，往往聚焦于“剥削的量”的调和，即争取更高的工资、更短的工时、更完善的福利待遇。它在本质上是在承认劳动力作为买卖商品的要素化前提下，就“要素的价格与使用强度”与资本进行讨价还价。资产阶级卫道士们所津津乐道的“高福利社会”，无非是资本为了确保劳动力要素的高效运转而支付的更昂贵维护费。

而第二种斗争，则是要彻底否定“人作为要素”这一历史前提本身！它直指托举着私有制最深层的根基——劳动力的要素化。它不再满足于在“资本—雇佣—权力”的关系网络中争取更好的被支配地位，而是要夺回“对劳动力商品生产过程的实际掌控能力”。它要消灭的，不仅是剩余价值的榨取者，更是将人的意识、智力、情感与体力强行打包切割为“生产要素”的整套资本主义生产逻辑。

然而，正是在当前的现实博弈中，我们看到了最令人警醒的“葡月错位”。

观照 2026 年 9 月至 10 月间以法国为中心爆发、随后席卷欧洲多国的庞大社会抗争运动，其内在特征恰恰印证了这种路线上的混乱。从巴黎郊区高中生封锁校门的抗议，到“青年黄马甲”在街头的呐喊，再到工会与极左翼力量的迅速卷入，这场运动声势浩大，却绝非一场摧毁旧世界秩序的阶级革命。

这场运动的悲剧性与错位感在于：青年学生与准无产阶级群体感受到了现实关系财富被剥夺的窒息感，他们拒绝被规训为资本大厦中干瘪的生产要素，试图直接发起一场诉求“主体尊严、解构权力压迫、去要素化”的第二种斗争。然而，他们既没有经过第一种斗争的严密锤炼，也没有建立起坚实的阶级组织与政治建构，更没有能力去撼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法权根基与国家机器。

这种脱离了历史阶段的空想抗争，最终沦为了无政府主义式的街头宣泄与碎片化的情绪表达。人们试图通过占据广场、网络声讨与去中心化的非暴力抵抗，来对抗早已深度融入社会血脉的资本逻辑。这恰恰混淆了解决“剥削机制”与消除“压迫根源”的历史先后顺序。其结果必然是：缺乏组织核心与政治纲领，特别是缺乏经过第一种斗争所建立起来的公有制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基础的“第二种斗争”，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建制化力量的围剿与微小福利妥协的分化下将迅速破碎，最终再次落入被资本统治秩序轻易收买和解构的宿命。

历史的辩证法绝不允许这种轻佻的跨越。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没有以彻底打破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为核心的第一种斗争作为坚实的政治基础与经济基础，任何关于“去要素化”与“夺回现实关系财富”的第二种斗争，都只能是流于空中楼阁的文艺复兴式幻想。

第一种斗争，是第二种斗争得以真正展开的不可逾越的前置条件。唯有通过第一种斗争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夺回了生产资料与社会总成果的统筹权，劳动者才有可能在根本上获得消灭“劳动力要素化”的历史舞台。